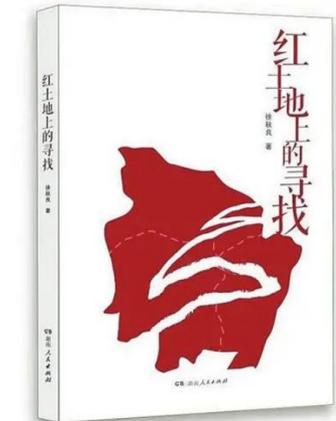


# 谋篇布局的妙笔艺术

## ——谈谈长篇小说《红土地上的寻找》



陈华

徐秋良先生的长篇小说《红土地上的寻找》，生动地塑造了红军将领黄公略的英雄形象，出色地在寻找中讲述好了红色故事、英雄故事，是引导广大读者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范例读本。

一部带有传记性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创造性撰写，是需要讲究创作方法的，怎么样拉开架势，人物形象的安排以及各种事件的进展，怎样才能营造出典型环境中使典型人物形象地立起来，并充填进大量的细节描写，这种创作方法，首要的是归纳到四个字——谋篇布局！

应该说，《红土地上的寻找》的整篇故事，

是以主人公牛均田、黄公略、江天健三条主线来叙述展开的。奇妙的就在这里，三人的故事齐头并进，组合得有条不紊，最终落实到了一点，突出了黄公略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更为奇妙的是，作者设下的悬念——寻找！虽然是在寻找黄公略的墓地，这是作者的巧具匠心，也为此铺开了整个故事的篇章，但当读完通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或者说是掩卷沉思的是，寻找，寻找到了什么？分明是使人寻找到了一个民族崛起的灵魂，生生不息、世代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而这种民族自信，又源于文化自信。这种寻找，是要继续发扬光大的，而不是将之丢失！这就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思想内涵以及灵魂所在。

黄公略这一条真正的主线在小说中的主导作用，就像一条主要的河流，容纳下了两条支流的汇入，哪怕是以宽容的胸怀接纳像江天健这样的须待救赎的“小支流”汇入进来，才形成了浩浩汤汤的奔腾的江河。牛均田的寻找就更不一般的寻找，与其说是他要寻找老首长黄公略的墓地，倒不如说是他亦在寻找千千万万英烈的灵魂，为了共和国的建立那种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精神。那么，江天健通过寻找黄公略墓地是要寻找什么？同样，他也在反思，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因为其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这就是长篇小说《红土地上的寻

找》的成功之处，而且是主旨意义上思想深邃的成功之处。

就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来剖析，作者恰恰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三条主线，撒得开，收得拢，正好弥补了史实不足带来的遗憾。试想，黄公略将军由于牺牲得太早，许多史实的东西都是碎片化的，虽然说有别人记录和整理的东西在，但还不足以使人们通过艺术的感染力来深刻地了解黄公略将军其人。文学创作是一个高深层次的展现，如果把黄公略的事迹平铺直叙地描述下去，必然会落入别人记录和整理的史实窠臼，高明的作者一般都会掂量掂量的，甚至根本无法下笔。然而，徐秋良先生却是敢写，而且写得有声有色，别具一格，驾驭全书，这与他高超的艺术功底与创作方法不无关系。

有了好的谋篇布局之后，人物就有发挥的场地了，作品中黄公略将军才有纵横捭阖的艺术舞台，一个一个的活生生的人物才会合情合理地相继登台，演绎出一曲曲悲壮的颂歌。这样的谋篇布局，也使作者自己有了充分的发挥余地，从而使读者感觉到枯燥无味，也使得各种倒叙和顺叙的手法顺理成章，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能把握得住的呀，一个一个的细节组成竟然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样，一气呵成，读来是那样亲切。其实，作者何尝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争”指挥者？总揽全局成竹在

胸，这就是作者巧夺天工谋篇布局的魅力。

当然，在好的谋篇布局里，作者还应理解人物性格形成的环境原因。作为一个小说家，不仅要理解每个人物的性格形成史及命运史，理解每个人物（包括最有罪孽的人物）多少都具有的命运的悲剧性。这才是艺术家俯瞰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历程时所特有的心态，包含着艺术家超脱的人生态度。从《红土地上的寻找》上看，作者是具有这个基础的，否则，作品不会如此成功。再有，语言的运用是这部小说的特色之处，修辞手法的讲究、优美通畅的语言成就了这部佳作。

徐秋良先生历时四载精心创作的这部作品，描绘了黄公略将军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刻画了一位信仰坚定、有勇有谋、骁勇善战、叱咤沙场、忠实践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将军形象，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红土地上的寻找》，徐秋良 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宣树铮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借李商隐诗句作书名，无端而取巧。我1989年来美国，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弹响了第五十根弦。本书中的文章都是来美国以后30年中所写，写的却是来美国之前50年间时代之变迁、世事之反复、人生之聚散。

我17岁进北大，18岁成“右派”，23岁大学毕业，戴着“摘帽右派”这顶帽子西出阳关，在天山脚下教中学。接着遭遇“文革”，总算侥幸，得苟全性命于乱世。

1975年二哥从美国回苏州老家探亲，我从塞北回江南一聚。夏日黄昏，一家人坐在门口纳凉。父亲跟二哥说：这些年来，他（指我）吃了不少苦头，以后还少不了，让他到你们那边去吧。二哥问我的意思。我说，父亲是在不能走的。父亲说，先不要管我，你们要紧。二哥说，那就先让坦弟（宣树浩）在芝加哥申请，第五类排期很长，排到了不想去可以不去。

1978年“右派”改正，1979年我调回苏州，1981年进苏州大学。同年父亲86岁过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学校里思想宽松活跃，气象一新；我工作也很顺，也做了教授，后来又又被选中中文系主任。不料1989年5月得通知，排期到了。走与不走，正推敲不定，历史投了一票，于是我们8月29日在虹桥机场上了飞机。

到美国后，在哥哥弟弟处小住，最后落脚纽约，纽约工作机会多。先是有人介绍到一家华人印刷厂，但路太远，我又不开车，只得作罢。后来房东把我带到中国城一家工厂，老板是他的朋友，三句话一说，我就成了熨衣工了。

两年衣厂岁月很快过去了。到第三年，工作、生活进入了窄轨，很单调，也很少有朋友来往。我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两个月左右上曼哈顿逛一次庞诺书店。后来我不去了，因为我突然“知天命”了，意识到我不会再读英文书了，中文书都读不过来呢，对中文萌生出孺慕之情的文化依恋。于是我给《世界日报》副刊寄了第一篇稿子：《家乡的水》。

给“世副”前后撰稿达七年之久，最后一稿发在2001年。

20世纪90年代中，高尔泰来美国，他和太太小雨曾来我家一叙。尔泰看了我在“世副”上发的一些文章后，笑眯眯地对我说：想不到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当即说，他给我联系甘肃出版社出版，还请台湾的罗青先生帮我在台湾联系出版。后来坦弟搭桥，以一个文化协会的名义邀我到芝加哥去做次讲座，见见面，谈谈。我去了。不知不觉，我就此进入了纽约、新泽西的文人圈，走到街上经常要和人打招呼。

1997年衣厂倒闭，原先的熨友们都转到中城的衣厂去了。太太不要我再找工作了，说：看你的书，写你的文章吧。

2001年，刘予建创办《彼岸》杂志，邀我去当总编辑。《彼岸》是大型全彩综合性人文杂志（月刊），每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篇幅刊登文学创作。

《彼岸》上，我也写过一些文章。2006年7月，社科院研究所王大鹏教授和他太太黄文华教授来纽约，他们都是我学长。黄文华说她看了我在《彼岸》上的那篇《寿衣》，认为可以力逼《背影》。我说，我的文字不合时宜，和现在读者的口味有代沟，他们不见得喜欢。黄说：你错了，现在有不少人就喜欢这样的文字。她这一声“错了”给了我不少安慰。

《彼岸》是2007年停刊的。接着《侨报周末》主编刘倩约我为《侨报周末》撰稿，就此写了13年专栏，至2020年5月《侨报周末》停刊。

《锦瑟无端五十弦》不是回忆录，只是杂糅在一起的忆旧散文。心有所思，情有所系，意有所托，就在五十弦上弹上一曲。关于“五十弦”，《史记·封禅书》上有一段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原来“五十弦”的基调是个“悲”，难怪《锦瑟无端五十弦》里忆及的人和事会飘散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伤。

（《锦瑟无端五十弦》，宣树铮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写我书

# 一弦一柱思华年

读有所得

# 真情是文学世界里的菩提

纪云裳

我读小说如做贼，在纸上一路窥探，见招拆招，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与隐秘的兴奋，事后着实回味无穷。读散文则像做客，尽可能施施然登门落座，与主人闲话家常，促膝而谈，一碟瓜子，半壶老茶，内心是笃定的，也是安然的，不时泛起回甘。

换言之，写散文就要做好敞开心扉、倾我至诚的准备。一个人的知识系统、文学根系、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都会在文中显露无遗。那么不妨把读者想得聪明一点，再聪明一点，摒弃机巧，以情动人。待客之道即创作之道，一如冰心女士的文学理念：“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

想来，这也是谢枚琼的《寻找真佛》获得第十届冰心散文奖（单篇）的理由。

作者外表有金剛相，内心却蕴藏了一种别样的柔软灵秀，近年来，笔力愈发笃厚从容了。《寻找真佛》应是一气呵成的吧。作者以“每逢周末必会发生的一个简短情节”为引子——“我”周末驾车回家，母亲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回家吃饭，“我”只简单地回答一个字“会”，母亲便挂断了电话。好比真正的大厨总是善于利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令客人难以忘怀的美味一样，这个引子不过是生活中极为细微的事情，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了抽丝剥茧的那根丝，沿着徐徐铺展开来的记忆的脉络，另一头连接的，正是一枚“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情感内核。

父母日益衰老，依旧不忘为“我”遮风挡雨；“我”在外工作，依旧每周风雨无阻地回家团聚。只因父母之爱是人生中最幸福的羁绊，且代代相传，环环相扣，我们身在其中，也终将成其为其中的一环，在时间的长河中，把爱小心翼翼地过渡。

在文中，作者巧妙地从会计学的角度阐释身体与年龄之间的关系，令人眼前一亮：“如果说一个人的身体是你拥有的固定资产，那么年龄肯定是你的累计折旧。”从而表达——在时间面前，我们与父母的缘分终究是有限的。也是这份“终须一别”，让幸福愈加动人和珍贵。

“我”五十岁生日那天，省吃俭用的母亲送给了“我”一个菩萨挂件：“崽啊，你五十岁了，不知道六十岁的时候，娘还在不在。送个小礼物给你作为念想吧。”“我”鼻子一酸，怔怔地接过红色小礼盒，好一阵回过神来，才讷讷地说：“您长命百岁啊！”这便是冰心女士所说的“真正感人的情境”吧，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时间的颠簸波光之下，是珍珠一般安静而朴素的爱。

作者最后用一个听来的故事收尾——有一个人离家远走寻访真佛。有一天，菩萨在梦里告诉他：“翻穿皮鞋倒穿鞋的那人，就是真佛。”原来，那是他的父亲。我们苦苦寻找真佛，殊不知真佛就在身边。湖南俚语中，佛与福谐音，对福“熟视无睹”的人，只缘身在此山中。

《寻找真佛》五千余字，作者却在纸上构筑了一个小小的人世间，让父母之爱的形象，在文学的范畴内获得了隽永。

一碗生活，万家灯火，亲情是人生的盐。而人生包罗万象，能让普通日常变成文学的，唯有真情。真情，才是文学世界里的菩提。或许，这也正是 ChatGPT 们无法取代的东西。

书香闲情

王学斌

范仲淹自求学起，便怀有大志。一日，范与几位朋友外出散步，走入一座寺庙求签。当他问签可否做宰相时，签答：“不能”。他接着问“能否为良医？”签答：“不能”。该结果令范氏顿觉郁闷，遂心中暗暗种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也正是在此信念激励下，日后即使官居要职，他始终未忘记经邦济世、直道而行的初心。

初入政坛，范仲淹担任的职务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可谓极不起眼的九品小官。然而，人微未必言轻，无论职务大小，不管岗位轻重，但凡在其位，一定要谋其政，范氏极其严谨的为官之道在此时已彰显无遗。范氏时常抱着卷宗去找太守，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太守争是非”。有些事情，太守已经做了决定，但范以为没有符合规矩或尚存疑义，便坚持原则，与长官论个是非曲直。即使惹得太守发怒，他也不会放弃原则。而且每次争辩完毕，范仲淹回到住处，还把今后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写在房中屏风上，于是日积月累，等他结束在广德军的工作时，屏风上已无余地再多写一个字。

到了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守孝期满，再度回归宦海。在晏殊的力荐下，他获得枢密院校理一职，职级不高，却地位优

越。不过晏殊举荐范仲淹并非由于私心，而是认定其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果然没多久，范仲淹就仗义执言，顶撞了掌握朝廷实权的刘太后。彼时宋仁宗年龄尚幼，真宗遗诏中规定刘太后可以对“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使得其在朝堂之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刘太后前后总计垂帘十一载，仁宗朝前期的政局与政策多出其手。然而，到了仁宗将近二十岁时，刘太后依旧没有打算还政于君的意思，范仲淹便借着一年冬天为太后祝寿的仪式之机，递上了一道奏折劝谏。

或许刘太后觉得区区一个枢密院校理的谏言无足轻重，并未有回应。范仲淹却不依不饶，又写一折《乞太后还政奏》，直言规劝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两道折子一上，太后还没有反应，却已吓坏了晏殊。被欧阳修称之为“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晏殊，自然将范仲淹指责责了一通。范氏即刻书写《上资政晏侍郎书》长信一封，自道“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故而秉持“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原则，坚决反对“少言少过自全”的做法。可以说，此信既是写给晏殊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座右铭，更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宋史》对此有非常鲜明的褒奖：范“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

《不要怕》

刘年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刘年的这部非虚构作品集，践行和强化了多年来他的“行者”形象，这是用“行万里路”“永远在路上”“田野调查”“民间意识”的综合行动力所建构起来的精神自我、斑驳现世以及生命诗学。

破碎的大地伦理、前现代性的乡愁以及自然作为命运共同体在刘年这里得以整合和重塑。更为重要的是刘年在这本书中打破了诗歌、散文、散文诗以及非虚构之间惯性的文体界限，体现了文体学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和创能力。这些开阔有度、转换自由、掷地有声的文字尽最大的可能性彰显出刘年朴拙而又特立独行的品性。



走马观书



《欢迎来到人间》

毕飞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是先锋小说沉淀后的重启，它让世界的荒诞性落脚在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超越了前两者。

这是一部带有开创性质的小说，形式回应着现实，现实促成了荒谬，荒谬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从而在无边无际、永恒绵延的生活流动中形成了一个文本的闭环。它的主人公兼具哈姆雷特与贾宝玉的气质，天使坠入凡间尘世，正常与扭曲、现实与梦幻、行为与心理之间纠缠纠结，难分难解。原生家庭、阶层流动、医患关系等等的芜杂细节，融化为生活的混沌整体，再跃升为普遍性的人生况味与生存的命题。

# 悦读

